



A Critical Study of Cui Shu's (1740-1816) Scholarship
Shao Dongfang

邵东方 / 著

崔述學術考論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A Critical Study of Cui Shu's (1740-1816) Scholarship
Shao Dongfang

邵东方 / 著

崔述學術考論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崔述学术考论 / 邵东方著. —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12

ISBN 978-7-5633-9297-1

I. 崔… II. 邵… III. ①崔述(1740~1816)—学术思想—思想评论②中国—古代史—研究 IV. K2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28550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广西桂林市临桂县金山路 168 号 邮政编码: 541100)

开本: 787 mm × 1 092 mm 1/16

印张: 20.5 字数: 360 千字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1 250 册 定价: 5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刘家和

这是邵东方博士所著的《崔述与中国学术史研究》。顾名思义,这就是要论崔述的学术,而且是就中国学术史而论之。书中的内容正好包括了这两个方面。

现在东方要我为他的这本书写一篇序,我很快就想到的,是人们目前是否还认为有研究崔述学术的必要和可能的问题。也许有人会说,关于崔述,早在本世纪前期顾颉刚等先生已经研究过了,结论也早有了,现在还有什么再研究的必要?又也许有人会换一个角度说,崔述当然还是可以再研究的,不过以前研究他的学者都是一些大师,现在我们是否还有取得新进展的可能?在这里我愿意谈一些管见,请专家和读者们指教。

首先谈对于崔述是否有再研究的必要与可能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其实含有两层意思:一是崔述学术的本身是否还有再研究的价值,二是经过顾先生等的研究以后,是否还有再研究的必要。

关于第一层意思,比较简单,因为崔述学术主张的核心是“无征不信”,这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实在是一个有永恒意义的命题,只要有“六经注我”的方法研究历史的现象存在,崔述的上述主张就总值得我们记取和思考。

关于第二层意思,顾颉刚等先生在几十年前对于崔述的研究,无疑是非常有价值的,将使他们的学术晚辈永远怀有敬意。为什么呢?因为第一,顾先生等随着时代和学术的进展,把崔述为了维护儒家经典的纯洁性而进行的疑古辨伪,发展成了为维护历史和文献真实性的疑古辨伪。以儒家经典为基准的疑古辨伪固然也要求真,但它的是非定于一尊,即儒家经典之一尊,所以其特点是封闭的;以历史真实性为基准的疑古辨伪,则除了知识的限制以外,不存在任何其他限制,而知识的限制本身总是要在历史的过程中被否定的,所以应该说顾先生等的学术特点是开放的。第二,顾先生等在事实上也绝对没有封闭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而恰恰是打开了新的

* 本书1998年由人民出版社初版,名为“崔述与中国学术史研究”,本文是刘家和先生为初版所作的序,今仍用之。

思路,顾先生曾说:“我们如果善学崔东壁,就应当超过崔东壁。”^①善学”就要“超过”,这对于我们是多么重要的启发。不仅如此,顾先生他们在讨论问题时,也是让各种意见充分发表,顾先生编《古史辨》时是如此,编《崔东壁遗书》时也是如此。就以后者为例来说,顾先生请他的朋友钱穆先生为这部书写序,而钱先生的见解实际上是与他不同的。^②甚至顾先生的老师,也就是促使他研究崔述的人胡适之先生,同他的看法也是有同有异的。这里不妨引用这两位先生为此书写的序中的话来作比较,顾先生说:

总之,他(崔述)根本的误处,是信古史系统能从古书中建立起来,而不知古书中的材料只够打破古史系统而不够建立古史系统。这个问题,康有为已经抉摘出来了。^③

他在此引用了康氏《孔子改制考》的第一卷《上古茫昧无稽考》,康氏在此中对崔述所采用的中国古史材料都取一概否定的态度,而顾先生颇以为然。这从当时破旧心切的角度来看,我们是能够理解的。可是,胡先生在序中说:

总而言之,近几十年的古史研究,大体说来,都已超过崔述的时代。一方面,他所疑为“后儒”妄作妄加的材料,至少有一部分(例如《檀弓》)是可以重新被估定,或者竟要被承认作可靠的材料的了。另一方面,古史材料的范围是早已被古器物学者扩大到几部“经”之外去了。其实不但考古学的发掘与考证扩大了古史料的来源,社会学的观点也往往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可以使旧日学者不敢信任的记载得着新鲜的意义。例如《檀弓》《左传》等书,前人所谓“诬”“妄”的记载,若从社会学的眼光看去,往往都可以有历史材料的价值。^④

所以只要把顾、胡二位先生的上述说法一相对照,我们恐怕就不能再说这些学术前辈们已经彻底解决了问题,封闭了这一研究,相反地,倒应该说他们的确给我们留下了可以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① 顾颉刚:《崔东壁遗书序》,见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页65。以下引此书只注书名、篇名和页数。

② 参见钱穆《崔东壁遗书序》,《崔东壁遗书序》,页1046-1052。

③ 顾颉刚:《崔东壁遗书序》,《崔东壁遗书》,页64。

④ 胡适:《崔东壁遗书序》,《崔东壁遗书》,页1044。

那末自从“古史辨”学派出现到现在,古史研究的学术条件是否已经有了历史性的变化呢?应该说变化还是很大的。一方面,考古发现和研究在近几十年间有了空前的发展,取得了重大的成绩,这是胡先生为《崔东壁遗书》写序时难以预料到的;而这些成绩足以使我们从过去往往疑为伪作的文献里看到很多真东西,例如《周礼》,过去几乎被视为全无价值的伪书,而现在竟然从金文材料中得到了很多官名的印证。不断出土的古文献,使我们对过去多有怀疑的书不能不刮目相看。这些进展,其意义不仅在于对一两本具体古书的真伪鉴定之上,而且在于使我们更加注意对古籍从多重角度加以慎重考察之上。

另一方面,近几十年来在史学方法上也有了很大的进展。以前从事疑古辨伪的学者对于真伪史料的划分是十分明确的,他们既对伪材料充满怀疑,又对真材料充满信心。崔述以为经书是可信的,非经书是不可信的,一信一疑,二者之间的界线极为清楚。十九世纪的德国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 - 1886)主张批判一切不可信的材料,而对于经过严格批判而被确认的第一手材料则充满信心,所以他才能满怀信心地说史学家能够“如实”(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直译当作“像其本身所是的那样”)写出历史书来。在这一点上,顾颉刚等先生同他们的中国和外国前辈们基本上是一致的,他们疑古辨伪的目的就在于求真,而对所辨得的真,他们是充满信心的。可是,物极必反,在西方,与兰克学派的实证主义史学思想相对立的相对主义史学思想,在十九世纪后期至二十世纪前期也相应地产生了。好吧,你说你的史料是第一手的,他就问你,一个曾经亲身经历了一次战争的战士甚至统帅所写关于这次战争的作品算不算第一手材料?你如说是,他就会说,一个人不可能亲历一次战争的一切过程和一切方面。于是你的第一手材料就成了问题,至少要打一个七折八扣。你说你的材料齐全,他就说历史上的事情有无限的方面和层次,历史上的记录从来就不可能完全,即使你做到了“竭泽而渔”,那也不能说你掌握的材料已经完全覆盖了客观历史事实。你说你的态度是纯客观的,他就说,历史学家著书,不仅在所用材料上有选择,而且连写什么主题都有选择,而这一切选择都出于史学家的主观的价值标准,你怎能说是纯客观的?例如,西方的哲学家狄尔泰(Wilhelm Dilthey, 1833 - 1911)、克罗齐(Benedetto Croce, 1866 - 1952)、历史学家贝克尔(Carl Becker, 1873 - 1945)、俾尔德(Charles Beard, 1874 - 1948)等,就都从哲学的或史学的角度提出了这一类充满相对主义史学思想的问题。当然,对于相对主义史学思想也出现了批评。我觉得美国学者曼德尔包姆(Maurice Mandelbaum, 1908 - 1987)所著《历史知识问题》(*The Problem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An Answer to Relativism,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0)对于相对主义史学思想的回答是相当精彩的,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看。我在这里只想说明,相对主义史学思想,就其对于兰克那样的史学绝对客观说的批判来说,不可否认有其积极意义;但是就其把相对绝对化的情况而言,它就又重复了它的批评对象所犯的 error,于是历史在他们那里变成了思想史,成了纯主观的东西,其实这只是把前人的错误在转了一百八十度的地方再来一次。不过,经过这一次错误的克服,作为研究历史学的人,到了这个世纪之末,我们总可以有了一种新的认识。作为史学工作者,我们既要努力弄清历史的客观过程即求真,又不能不虚心承认,我们所能求得之真总是有其一定限度的。我们不同意相对主义的史学思想,而承认有限度的或相对的真在本质上仍然是真;同时,也不同意实证主义史学思想,不再天真而自负地去追寻绝对的或纯客观之真,而只能细心地从含有前人解释或价值判断的材料中去把握历史之真。我们注定只能力求逐步地逼近历史之真这一极限,而不幻想一步达到这个极限。诸如此类的认识,在二十世纪前期顾先生等从事古史辨活动的时候,大概还没有提上中国史学界的思考日程。就连胡适先生在谈到新观点“可以化腐朽为神奇”的时候,似乎也还没有考虑过如何对待相对主义史学思想的问题。这就是说,几十年来史学思想和方法的历史条件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发展。

既然有了以上两方面的巨大发展,现在再来研究崔述就不能认为是多余的,而确为必要的了。

至于现在的研究是否有可能取得比前辈更多的新进展,那就要看我们的努力如何了。那末是否必须是大师才能从事这种研究呢?这倒未必。须知顾先生开始古史辨伪研究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之初,当时他年未三十,也还不是大师;顾先生成为大师是他多年研究后的成果证明的,不是先成大师而后才有成果。所以我认为,以十分严肃的态度从事某一课题的研究是必要的,至于研究者是不是大师,可以先不管它。如果必先为大师而研究,那末人类就不会有大师了。

当然,必须承认在当前研究崔述决非一件易事。那末难处在哪里呢,这一本书又是从什么地方努力的?这就是我要谈的第二个问题。

我以为,研究崔述之难,难在两个方面,更难在这两个方面的结合上。哪两个方面呢?一是既然要研究崔述,就不能不追踪他所研究的内容,即中国古代经史之书及其所载之事。就此一点而言,这对当前的中青年学者来说,真是谈何容易。可是,如果不钻进去,只在崔述的一般学术主张上兜兜圈子,那末这样的研究恐怕倒

真是不能有新进展了。真钻下去,这在某种程度上差不多也可以说要有下地狱的决心。这是从微观的角度说。可是,只有这一方面的努力是不够的。如果不能考虑到当前研究方法上的发展,那末,即使钻的深度达到清朝汉学专家的程度,那同样没有多少价值;因为钻进去了出不来,只不过多了一位次崔述而已(纯粹跟踪崔述,只能成为次一等的崔述。这个意思和顾先生说的学崔述就要超过崔述是一样的),又有何益?或者换一种方法,把崔述不放在眼下,引用一些现在时髦的理论或方法,天花乱坠地纵论一通,新则新矣,可是又容易流为无根之谈,恐怕也未必能有新进展。所以,这里我们还必须说到第二种难处,那就是目前在西方盛行的哲学诠释学(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等,对于研究崔述的确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可是,我们要认真地学习一下(而不是随意的“掠夺性的开采”),那又谈何容易。我们是研究史学的,要有一些自知之明,不幻想成为哲学家,但是既要试图援用它,就不能不下点功夫认真读一些。我们只能从中获得某些启发,来开拓史学研究的思路。这是从宏观的角度上说。

记得从前有一位学术前辈说过,“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这已经很不容易。而现在则是要“上穷碧落下黄泉,以求稍有新发现”,这就更是难上加难了。由此我想到了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Thomas Kuhn, 1922 - 1996)的一篇文章《必要的张力:科学研究中的传统和创新》(*The Essential Tension*)。他说,科学的发现,既需要发散思维即对于传统具有突破性的创新思维,又必须有向心思维(convergent thinking)即深入传统的思维。这是因为,没有前一种思维,就会限于传统而失去创新的可能;没有后一种思维,就不能深知传统中的问题与病因所在,就不知到底为何需要突破,应该从何突破,即使突破也破不到点子上,何来创新?所以,他概括地说:“成功的科学家常常必须同时扮演传统主义者和离经叛道者的角色。”^①库恩讲的是科学发展的要求,其实对于史学的发展来说,这几乎是同样适用的。这就是要“上穷碧落下黄泉”,要有微观与宏观、传统与创新两极之间的张力。要真正形成这样的张力,这就更加谈何容易。

现在我可以高兴地说,东方在这本书里是尽力朝这两个方向努力的。

他对崔述学术的研究,不是先列崔氏自己所说的学术主张,然后再罗列事实,以说明崔氏是怎样在学术实践中贯彻自己的主张的,而是宁可从崔述所研究过的

^① Thomas Kuhn, *The Essential Tension: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in Scientific Research*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7), 225 - 239.

具体问题入手,这样,他就必须重视在微观问题上的努力。例如,他研究崔述对周公称王问题的见解,不仅研究崔述所引用的材料,而且十分注意清代以至近代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特别注意考古新发现的成果。这样的工作自然不可能是太轻松的。又如,他对《今本竹书纪年》诸问题的考论,直接地说,他是在同陈力先生商榷,间接地说,他仍然是在探讨崔述所曾探讨过的问题,即继续崔述对《今本竹书纪年》的工作。陈力先生的文章是否定崔述对于《今本竹书纪年》的辨伪结论的,而且写得很博雅,东方不同意陈力先生的看法,就不能不与这一篇引证广博的文章相辩论。这样的工作,也是必须在微观上下功夫的。

东方虽然从微观方面着力研究崔述,但又不仅仅以此为满足。他对于崔述具体文章和论点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为了从更深的层次去了解崔述本身。例如,通过对崔述的周公不曾称王说的分析与评论,他一方面是要辨别此一问题之是非,而另一方面则进一步了解崔述学术内部的深层矛盾;虽然崔述在主观上力求摆脱成见,但是在客观上并未能完全排除先入之见的作用。

6

了解或把握崔述学术的内在矛盾,似乎是他这一本书的各篇中都可以看到的话题。书中第一篇谈崔述学术的几个问题,实际上就是从四个方面探讨了崔述学术的内在矛盾。说到这里,有一点必须交代清楚,那就是,讨论崔述学术的内在矛盾,决不意味着崔述的学术是充满矛盾而不值一提的。相反地,我们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几乎历史上一切有成就的大学者都不可避免地有其深层的内在矛盾。如果他的学术已经到了完满无缺而无任何矛盾的程度,恐怕学术真的就要到他为止了。黑格尔(G. W. F. Hegel, 1770 - 1831)说:“凡有限之物都是自相矛盾的,并且由于自相矛盾而自己扬弃自己。”^①我们这里所说的崔述学术的内在矛盾,就是从这个意义而言的。所以,东方努力把握崔述学术内在的深层矛盾,决非要对崔述作简单的否定,而是力求从更深的层次来看清,崔述的学术是怎样从其前辈学者转化而来的,又是怎样对以后学者发挥其影响的。力求看清崔述学术的内在矛盾,就是力求了解它是怎么样在中国学术史中运动的。

当然,以上的说法也许还嫌不够具体,现在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崔述说:“人之情好以己度人,以今度古,以不肖度圣贤。”^②又说:“余生平不好有成见,于书则就书论之,于事则就事论之,于文则就文论之,皆无人之见存。”^③可是,就在崔述批

① 黑格尔著,贺麟译:《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页177。

② 崔述:《考信录提要》,《崔东壁遗书》,页4。

③ 崔述:《考信录提要》,《崔东壁遗书》,页16。

评“以己度人、以今度古”一段文字之中,他列举了两个事例作为说明,一是关于一位行善的僧人的,一就是关于他自己的。这些不都是以己度人、以今度古吗?崔述自己甚至都没有发现这样的问题。胡适先生显然比崔述高明多了,他发现了崔述有“自坏其例”的地方。这真能发人之耳目,使人们的思维有所突破。胡先生还很厚道地说:“这都是时代风气的限制,不足为崔述的罪状。”^①这些话都说得很中肯。不过,到了哲学诠释学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其他学科尤其是史学的今天,我们就不能只把话说到胡先生那种程度为止了。因为崔述要考证古史就不能不理解古史,如果不用他已有的知识或先有的判断去看古史,他又如何能理解呢?所以,以己度人、以今度古本来就不是可以避免的,甚至还可以说,它也是认识赖以进行的一个主观前提。那末照这样说,人们是否就可以任意地以己度人、以今度古呢?当然绝对不是,其间有一对于“先见”(prejudice 或 vorurteil)既须承认其必要性,又要明确其合理程度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又是胡适之先生当年所不及讨论的,也属于一个历史限制的问题。而东方书中的《经义求真与古史考信——崔述经史考辨之诠释学分析》一文就是试图在这一点上作新解释的。据我所知,似乎还没有前人从这样的角度论述过崔述学术中的内在张力(tension)。如果真的是这样,东方的这一努力尽管只是一个开始,也应该说是有意义的。

因为这十余年来和东方在学术上的往复讨论较多,比较了解他的学术思路,所以谨作序言如上,尚祈有关专家及读者有以教之。

1997年10月于北京师范大学补拙未暇书室

^① 胡适:《崔东壁遗书序》,《崔东壁遗书》,页1044-1045。

目 录

序 / 1

关于崔述学术的几个问题 / 1

崔述的疑古考信和史学研究

——与王元化先生论学书(1992年5月25日) / 32

王元化先生致邵东方君书(1991年8月10日) / 48

王元化先生致邵东方君书(1991年12月4日) / 50

王元化先生附识(1992年7月12日) / 51

崔述的古史考证与周公摄政称王问题 / 52

崔述在清代儒学定位之重新考察 / 73

论胡适、顾颉刚的崔述研究 / 124

经义求真与古史考信

——崔述经史考辨之诠释学分析 / 189

附录 考信录提要 / 223

Prolegomena to My *Inquiries into Verifiability*(*KaoXinlu tiyao*) / 249

初版后记 / 314

再版后记 / 315

关于崔述学术的几个问题

崔述(1740-1816)^①,字武承,号东壁,直隶大名府魏县(今河北大名)人。作为清代乾嘉时期的学者,崔述毕生致力于上古史的研究。他采用以经证史的原则,对所见古书古事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辨伪考信。崔述的全部著作以及后人研究崔氏的主要论著均已收入顾颉刚(1893-1980)编订的《崔东壁遗书》^②。由于种种原因,崔述的考据学不为清儒所重视,故在清代学术界没有发生很大影响。然而,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随着“古史辨”运动的兴起,崔述的疑古思想却为胡适(1891-1962)、顾颉刚等人所看重,起到了推动新史学发展的意外效果。胡适称崔述的《考信录》“在清代要算一大奇书”^③,把崔氏誉为“科学的古史家”^④。同样地,顾颉刚也说:“我们今日讲疑古辨伪,大部分只是承受和改进他[崔述]的研究。”^⑤经他们的鼓吹,崔述学术复昌,其著作大有造于当时兴盛一时的疑古辨伪潮流,诚如钱穆(1895-1990)所云:“迄于近代,盛推清儒考据,而东壁遗书几于一时人手一编。”^⑥然而前辈学者在肯定崔述的同时,有意或无意地流露出一种偏见,即他们对崔述之学,多择精语详,津津乐道,推重其成就,而对其中之不足,则往往一带而过,不求全责备于前贤。本文遵照不为贤者讳的古训,拟于崔述学术中的几个问题略申己见,以冀补前贤所说未备于万一。

一、疑古与尊经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不少前辈学者高度评价崔述的疑古精神,如钱玄同(1887-1939)对胡适说:“你说崔述是二千年来了一个了不得的疑古大家,我也是

① 本文所涉及人物首次出现时,除不可考者外,均由笔者附上生卒年。

② 顾颉刚编:《崔东壁遗书》(以下简称《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以下版本同)。

③ 胡适:《自述古史观书》,《古史辨》第1册上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重印本,页22。

④ 胡适:《科学的古史家崔述》,《遗书》,页952。

⑤ 顾颉刚:《崔东壁遗书序》,《遗书》,页60。

⑥ 钱穆:《读崔述洙泗考信录》,《综合月刊》1974年第11期(下同),页124。

这样的意思。”^①可是他们尽管备论崔氏之疑古辨伪的成就,却对其疑古思想的来源和传承关系未加申论。举例而言,崔述对各种有关三皇五帝传说的否定,一向被认为是很有勇气地打乱了传统的古史系统。崔述尝云:“羲、农以前未有书契,所谓三皇、十纪帝王之名号,后人何由知之?”^②又云:“古者本无皇称,而帝亦不以五限。”^③批评后人曲合其数从而导致各种说法互相矛盾。他还论证“古帝王之兴以五德相终始”之说不足信,指出此说并不见于战国之前的古书,而是始于邹衍,再由刘歆(约前50-23)等人出于政治需要而加以系统化。^④这些说法都被“古史辨”派推崇为崔述独特的创见。实际上,崔述之疑“三皇五帝”说并非其独到之见,乃是与宋儒的怀疑精神一脉相承的。宋代学术疑古风盛,北宋欧阳修(1007-1072)的《新唐书》、刘恕(1032-1078)的《资治通鉴外纪》及南宋魏了翁(1178-1237)的《古今考·高帝纪》等都对三皇五帝的传统说法表示了怀疑。^⑤刘恕曾云:

《六经》……皆不称三皇五帝三王,《易·下系》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包牺氏没,神农氏作;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继世更王而无三五之数,或以包牺至舜,是为五帝,然孔子未尝道,学者不可附会臆说也。^⑥

崔述亦谓:

《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伪孔安国尚书序》云:“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孔子睹史籍之烦文,惧览者之不一,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后之儒者皆尊其说;余独以为不然。夫古帝王之书果传于后,孔子得之,当何如而表章之,其肯无故而删之乎!^⑦

① 钱玄同:《玄同先生与适之先生书》,《古史辨》第1册上编,页27。

② 崔述:《补上古考信录》,《遗书》,页28。

③ 崔述:《补上古考信录》,《遗书》,页27。

④ 崔述:《补上古考信录》,《遗书》,页49-50。

⑤ 参见刘起釪:《几次组合纷纭错杂的“三皇五帝”》,《古史续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页116-117。

⑥ 刘恕:《资治通鉴外纪》卷1。

⑦ 崔述:《考信录提要》,《遗书》,页17。

崔述之说显然与宋人的看法一脉相传,甚至可说派生于刘恕之言。

就疑古思想而言,崔述与宋儒既有其同,也有其异:所同者,崔述疑古多承宋人之余绪,并无特殊发明;所不同者,宋代学术空气较为自由,故宋人敢于疑经,而崔述所疑多为传记所载,并且又是作为古史来疑。当然,无论宋儒还是崔述,他们的疑古都未超出维护圣道的范围。儒家经典的一个特点就是重视“先王”,孔子、孟子都未曾言及三皇五帝,崔述怀疑三皇五帝正是继承了儒家的这一传统。崔述说,“孔子祖述尧、舜,孟子叙道统亦始于尧、舜”^①,并注意到“经传述上古皆无三皇之号”^②,可见他是为了维护儒家的道统才怀疑三皇五帝说的。而且从历史上看,宋元以降,历代朝廷对三皇五帝的祭祀逐渐废弛,三皇五帝的权威在经学家眼中虽未完全消失,但却毫无疑问地日渐式微了。崔述只是怀疑以三皇五帝为中心的古史系统,而对儒家经典则奉为金科玉律,没有予以怀疑和批判,这显然不能看作一种冲破传统的举动。吕思勉(1884-1957)曾云:“《崔东壁遗书》,近人盛称其有疑古之功,此特门径偶然相合。”^③这是很公允的。从今天的眼光看,三皇五帝的传说已不再是虚无缥缈的神话故事,它们已成为史学家研究中国史前社会的重要资料,因为这些传说反映了这一时期社会演进的各个不同阶段的性质。^④

从《考信录》里,我们得知崔述的疑古思想还受到唐代史学家刘知幾(661-721)的启发和影响。刘知幾曾在《史通》中斥责刘向(公元前77-前6)和嵇康(224-263)将战国寓言认作历史实事之误,并以《左传》为据来驳秦汉之书。崔述由此得知,秦汉之书所载古史多有不可靠处,而原因就在于“战国之时,邪说并起,寓言实多,汉儒误信而误载之”^⑤。于是他说道:

故今为《考信录》,于殷周以前事但以《诗》《书》为据,而不敢以秦汉之书遂为实录,亦推广《史通》之意也。^⑥

① 崔述:《考信录提要》,《遗书》,页18。

② 崔述:《补上古考信录》,《遗书》,页26。

③ 吕思勉:《读崔东壁遗书》,《论学集林》,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以下版本同),页177。

④ 参看李衡眉:《三皇五帝传说及其在中国史前史中的定位》,《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页179-190。

⑤ 崔述:《考信录提要》,《遗书》,页7。

⑥ 崔述:《考信录提要》,《遗书》,页6。

不过,崔述与刘知幾在疑古方面还是有所区别的。刘知幾对文献中的各种异说参会疏通,目的是使学者知古书之妄及古说之虚,故他考辨古史、训说古经,主要是怀疑古史记载的真实性,而非辨别古籍的真伪。刘知幾有谓:

古文载事,其词简约,推者难详,缺漏无补。遂令后来学者莫究其源,蒙然靡察,有如聋瞽。今故诃其疑事,以著于篇。^①

崔述在疑古史记载不实的方面比刘知幾更进了一步,因为他直接怀疑古书本身之真伪,这显然是受了宋人辨伪思潮的影响。可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刘知幾在《史通》的《疑古》和《惑经》篇中大胆怀疑古代圣人,对经传记事荒诞不实处提出质疑,如《疑古》开篇所列十条就是揭露《尚书》对古代圣人的虚美夸张,从而说明经书不可尽信;而崔述的疑古则是为了维护圣贤之道而纯化经典,因此在他看来,圣人是不能被怀疑的。在这一点上,崔述的怀疑精神较之刘知幾大为逊色。当然,刘知幾之所以敢于怀疑,与其所处时代背景不无关系,唐代朝廷的思想控制远不如清代之严厉,所以我们看到刘知幾思想中的异端色彩较浓厚。就此而言,崔述的疑古思想一方面是受到了前代学者的启发,另一方面又在不少地方未能超出前人的认识水平。

以怀疑古书的程度而言,崔述不但没有超过刘知幾,而且也比不上清初辨伪考据学家阎若璩(1636-1704)。阎若璩在对《古文尚书》进行辨伪时,有人对他说:“子于《尚书》之学信汉而疑晋疑唐,犹之可也;乃信史传而疑经,其可乎哉?”阎若璩的答复如下:

何经,何史,何传,亦唯其真者而已。经真而史传伪,则据经以正史传可也。史传真而经伪,犹不可据史传以正经乎?^②

由此可见,阎若璩不仅疑史传,还敢于疑经。在这方面,崔述无法与阎若璩比肩,因为他虽敢破传,却不敢破经。吕思勉说:“崔氏所疑,虽若精审,然皆以议后世之书则是,以议先秦之书则非。”^③这说明崔述的疑古范围只限于以圣人之书疑后代之

① 刘知幾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页381。

② 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皇清经解续编》卷29,艺文印书馆1986年版,页25。

③ 吕思勉:《读崔东壁遗书》,《论学集林》,页177。

书,而这样的怀疑并没有超出传统辨伪学的范畴。当然阎若璩之所以敢怀疑经书,一方面是因为阎氏本人在学术上颇为自负,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生活的年代较早,其著述活动完成于清廷大兴文字狱之前。

在评论清代学术人物及学术著作时,梁启超称赞崔述及其《考信录》道:

此书虽非为辨伪而作,但他对于先秦的书,除《诗》《书》《易》《论语》外,几乎都怀疑,连《论语》也有一部分不相信。他的勇气真可佩服。^①

但是我们必须知道,崔述是在尊经的基础上怀疑古书古事的,他主张考信古史“但取信于经”^②。他作《唐虞考信录》的自订原则是:“《尚书》以经之,传记为纬之,其传而失实者则据经传正之。”^③可见他是以某种权威性的东西即《五经》为标准去怀疑古书古史。所以胡适说:

他[崔述]著书的最初动机并不是要考证古史,不过是要推翻传说,回到古经,以存理想中的“圣人之真”。^④

此说当然无可非议,但从更深一层看,崔述以经书作为疑古考辨的准绳有两个理由:

首先,从史学的角度来说,经书中包含大量的史学内容,是研究上古史最基本的材料。崔述指出:“三代以上,经史不分,经即其史,史即今所谓经者也。”^⑤他的这一主张有其合理内核,那就是,与所记史事大体同时代或时间接近的材料,由于各种原因而造成的讹误较少,故其可据性就相对地高,可以归入原始材料的范围。诚如顾颉刚所言:

他[崔述]的“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这个标准,在考古学没有发达的时候,实在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尤其是在战国、秦汉间百家异说杂然并起的时候,因为六艺

①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页314。

② 崔述:《考信录提要》,《遗书》,页4。

③ 崔述:《补上古考信录》,《遗书》,页51。

④ 胡适:《科学的古史家崔述》,《遗书》,页989。

⑤ 崔述:《考信录提要》,《遗书》,页20。